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二輯 第六冊

史學  
及外  
國史  
研究  
論集

大陸雜誌社印行

大陸雜誌史學書第二輯第六冊

史學  
及  
國史外  
研究



大陸雜誌社印行

1377

第六册 史學及外國史研究論集目錄

清乾嘉時代之歷史考證學.....	杜維運	〇〇一
西歐經濟復興與歐洲共同市場.....	曹虛白	〇〇二
一個歷史家的信仰.....	楊紹震	〇〇九
東南亞研究中的亞洲著名城市.....	吳景宏	〇四六
印尼歷史略談.....	黎東方	〇五六
語文學、考古學、人類學、史學與人類及其文化史的研究.....	楊希枚	〇六一
最近十年之甲骨學.....	董作賓	〇六七
介紹拉圖萊教授的「中國歷史與文化」.....	周咸堂	〇六九
「方志」之分類問題.....	徐玉虎	〇七一
西洋近代的東方學及有關中國古史的研究.....	楊希枚	〇七三
中國歸史的週期及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	勞希齡	〇七九
在美國研究宋史的一些途徑.....	劉子健	〇八七
關於「近代中國之西方認識」並論中國思想史問題.....	胡秋原	〇九一
中日邦交之我見.....	木下彪	一〇二
東南亞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李亦園	一〇五
人類歷史和自然歷史.....	V. G. 柴爾德著 藍天益譯	一一一
明清兩代輿運羅.....	李光濤	一一七

史學及外國史研究論集目錄

二

記普林斯頓大學葛斯特東方圖書館遺碎  
胡適之先生著作展覽會及其相關之史料

莊申 一二六

趙翼之史學

杜維運 一三三

文化接觸變遷的過程

吉田禎吾原著  
徐人仁譯 一三八

清盛世的學術工作與考據學的發展

杜維運 一四四

蘇俄編史學變遷的歸趨

P. Urban 著  
黃天健譯 一五四

印尼的真面目

馬樹禮 一六一

美國早期的亞洲研究

錢存訓著  
沈麗環譯 一六九

國際最近情勢

程天放 一七五

東南亞的民族源流與文化傳承

衛惠林 一八九

匯印衝突的背景與展望

吳俊才 一八三

法國侵略安南、東京與交趾支那之史的研究

蘇珠璣 一八九

法國統治安南東京與交趾支那的殖民行政組織與殖民政策之研究

蘇珠璣 一九五

俄國在遠東與中東的侵略政策——一八八〇至一九一四——

張致遠 二〇五

柏林與金門、德國與中國

德國多默博士 二二三

星馬歷史略談

黎東方 二二六

緬甸歷史略談

黎東方 二二二

美國近年來外國語文及外國文化研究之發展

許芥星 二三七

匪印關係之演變	吳俊才	二四〇
越南歷史略談	黎東方	二四八
泰國歷史略談	黎東方	二五一
高棉歷史略談	黎東方	二五六
寮國歷史略談	黎東方	二六〇
近代日本之形成與其展開——「明治維新」	森谷秀亮	二六五
近代日本之形成與其發展——「近代國家之發展」	森谷秀亮	二七一
近代日本之形成與其展開——「日俄之戰」	森谷秀亮	二七五
歷史一詞的來源	毛一波	二七九
中國史學對於日韓越的影響	朱雲影	二八〇

# 清乾嘉時代之歷史考證學

杜維運

## 一 概 論

(一)乾嘉時代歷史考證學派之全貌

乾嘉以前，中國之史學，蓬蓬勃勃，最富創作精神。北宋史學大家之輩出，史學巨著之接踵問世，固不待言。即以清初而論，中國史學界仍氣象煥發，栩栩然有生氣，以極勇銳之努力，浩瀚之氣魄，欲為大規模之創造者，輩出不絕。志修明史者，黃宗羲萬斯同而外，有吳炎，有潘耒，有戴名世，皆發願以私人之力著明史，刁錞鼎鑊之諱，若有所弗規。顧炎武治史雖已好言考證，然於歷代典章制度風俗習尚，多論列得失，以寓其經世致用之思想，是亦史學之一新支也。此時由顧氏新創之浙西之學，亦遠不若由黃宗羲開山之浙東史學為盛。

時至乾嘉，風氣驟變，考據學風靡學界，一時史學大家，咸以考據學治史學，不言近世，但攻古代，利用補助知識之廣博，為古史訂謄文，正誤謬，補闕遺，舉此則不敷有所能勝縱橫，若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若錢大昕之二十二史考異，其代表著作也。於是蔚為聲勢浩蕩之歷史考證學派，聰明才智之士，咸趨此途。以大文學家章學誠之臆才宏識，大聲疾呼，思有矯正之，而無不能有所動。風氣所趨，非一二人所能挽回也。

史學重創作，發凡起例，能創垂體大思精之鉅著，而史料去取之際，偶一不慎，流弊由之而發生；史學重考證，創舉發見，能

啓釋千古不解之疑案，而學術補苴之餘，繁瑣瑣屑，史學因之以萎靡。乾嘉一百年之盛世，若馬班溫公之史學經著不可見，以視大昕之博學多識，僅以最卓越之歷史考證學家名，史學界有考據之作，而無新著之史。吾人今日研究清史，詳得聞清代當時人之記載，中國自漢魏以來二千年，私家史料之缺乏，亦未有甚於清代者。史學以記述當代為首要，時代愈近，史料愈多，知之愈詳，詢訪實證亦愈便，以史學自任者，不以其時撰成宏博翔實之書以貽後人，致使千百年後，此一時期之史蹟，遂難揣擬，幾無無數專家，耗畢生之力，轉轉考證，而仍不能得其完全真相，此不能不令人浩嘆，而史學家亦不能不引為愧作者也。不幸乾嘉時代，史家集精力於博考古史，致以當代事蹟為不足研究，此種學風及其心理，遺傳及於後輩，專喜摭拾殘編，不思創垂今錄，迄今中國史學界仍有此現象。此中國史學之衰也。

雖然，中國之史學，亦至乾嘉而驟放新異彩。

乾嘉時代之史學，卓然超越於前代者有二，一曰徵實之精神，二曰科學之研究方法。此二者不惟開中國史學之新風氣，亦與西洋近代之新史學，遙遙相合。今請言其大端：

歷史考證學派治史，最富徵實之精神與科學之研究方法，亦與十九世紀歐洲語文考證學派之治史，殊僅若相接近。歷史考證學派認為史家應不虛其，不隱惡，據實直書，以使歷史真實。白，語文考證學派大師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

IRB) 於其日爾曼與羅曼尼民族史一書之序言曰：「歷史之目的，係為指示過去實際發生之情況而已」；歷史考證學派利用經學、小學、天文、輿地、金石、版本等補助科學，以考訂史料，語文考證學派亦利用語言文字以批評史料；歷史考證學派凡立一義，必必證據，歸納衆多史實而成其說，語文考證學派亦由史料而產生其史學觀點，雖去事實而不敢有所馳騁，同是神往於徵實之信史，同是從事於史料之批評，同是着重於史實之考索歸納。換言之，亦即皆富有實事求是之精神及科學之研究方法。此為中外史學上一殊絕趣味之比較，亦人類智慧之所應自奮者。中國於明清之際，耶穌會教士紛紛東來，傳教之外，大量介紹西學，中國朝野人士，一時為之風靡，然其時雖介紹而發生影響之西學，祇天文曆算等實用科學，歐洲之史學，則未對中國史學界發生若何影響。清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放逐耶穌會教士，西學中絕者百年。此百年中，適值清雍乾嘉盛世，亦即中國歷史考證學極盛時代，此時中國史學之獨立發展，自不待言。自此時諸史家之全集中，亦不能發現若何受西洋史學影響之痕跡也。且此時適值十八世紀，歐洲語文考證學派，則十九世紀之產物也。二者相去百年，而互不相謀，中國且發達早於歐洲者百年，此足證我國史學進步之神速，亦可說明我中華民族為世界一極優秀之民族也。史學家每言此種史學風氣之形成，由於明末王學之積弊，由於清代文網之森嚴，斯固理所不與。吾則以為主要由於史學發展之自然趨勢。中國兩千年史學之發揚，成就雖偉，流弊亦多，或強立文法，或妄相附會，或馳聘議論，或舞弄文墨，史學經製雖浩如煙海，毗睚辨別則不一而足，史學發展至此，已成積重難返

之勢。清儒生值其後，一反其虛妄，為之剝離發復，為之徵實考信，以掃清兩千年史學之陰霾，此史學家應有之覺悟，亦史學演進之自然過程也。洎乎風氣既成，舉世趨之，但事考訂，不知其化之自然過程也。十九世紀以後，歐美史學突飛猛進，中國史學則陷於停滯狀態，雖同光以後，中西文化急驟交流，中國史學受歐美史學之激盪，而發生蛻變，然所變者無幾，不過以尼博爾（Barthold Georg Meubhr 1776—1831）前克等歷史語言之考證，代替乾嘉時代之考證耳，同樣局促於史學破碎之小問題，同樣不能產生體大思精之大著作，故雖謂自乾嘉以來，中國之史學，無若何重大之進步可也。嗚呼，三百年之史學，徘徊於考據一途，而不另進一境焉，寧不可慨乎哉，就中國史學固有之所長，參以歐美史學研究之方法與撰述之體例，以創建中國今後之新史學，實為當今之急務矣。

(2) 歷史考證學派治史之求真精神

歷史考證學派治史，最富求真精神，實事求是，不涉虛誕，反對馳聘議論，反對書法異說，主張史學家應不虛美，不隱惡，據事直書，以期不失史實真相。錢大昕云：

「史家以不虛美不隱惡為良，美惡不掩，各從其實。」（《史記志疑序》）

又云：

「史家紀事，唯在不虛美，不隱惡，據事直書，是非自見。若各出新意，掉弄一兩字，以為褒貶，是治絲而勢之也。」（《十駕齋養新錄序》）

王鳴盛於十七史商榷中所言，尤足代表此派治史之精神：

「大流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純據議論，以明法戒也；而當考其典制之實，俾數千百年史直治事，瞭如指掌，而成宜戒，或宜法，神人之自擇焉可矣。其事蹟則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禮加與奪，以為褒貶也；但當考其事蹟之實，俾年經事緯，部居州次，紀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貶，聽之天下之公論焉可矣。書生向處，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詳，而議論褒貶，猶恐未當，況其考之未確者哉。蓋學問之道，求於虛不如求於實，議論褒貶，皆虛文耳。作史者之所記錄，讀史者之所考核，應期於能得其實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耶？」

治史能期於得其實，不務議論褒貶之虛文，已得史家治史應遵守之主要原則，亦為中國史學上之一大進步。中國史學，自宋以後，有兩派甚佔勢力，一派為胡安國歐陽修之流，務為簡單具體之文詞，行其詭詞強說之褒貶；一派為蘇洵蘇軾父子之輩，效縱橫家言，任意雌黃史蹟，以為帖括之用。自清初顧炎武倡導以考證治史，史學風氣，已趨健實。迄於乾嘉，錢大昕王鳴盛等漢其流，積極提倡，於是中國史學界之風氣驟變，此輩謂之中國史學上之一大革命，亦無不可也。惜乎此派史家，皆偏促於零星問題之考訂，未能進一步領其生平研究之所得。垂創微信千古之一家著述，有考史之辛勤，而未窺著史之境界，此則可為浩歎者也。

### (3) 歷史考證學派治史之科學方法

歷史考證學派治史，如何而求其耶？曰：由於利用科學方

法。歷史考證學派之特色及其對於中國史學之貢獻，亦在於科學方法之獲得應用於史學。余嘗推究其最普遍通用之方法有二：

#### 一、歸納法之充分利用

考證學派史家，讀史皆作「櫛記」，心有所得，則條記於紙，每每積至數千百條，由此備儲之大量資料，再歸納而得其新說。此法偏自顧炎武，至乾嘉而廣泛應用，若錢大昕之十駕齋集新錄，即應用此法之結晶。凡一說之立，必憑證據，由證據而產生其說，非由其說而找尋證據也；證據之選擇，以最原始為尚，如漢書與史記抵牾，則寧信史記而不信漢書；孤證不定其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隨證據或由解證據，則視為大不德。於是形成一種「為學問而學問」之學術研究風氣，治史不先有任何觀點，不滲有其他因素，由史而治史，由屢次發生之史蹟，而說明歷史之現象，故往往能訂古人之謬，發千載之覆。

#### 二、補助科學之廣泛利用

考證學派史家，治史廣泛利用補助科學，以作史實考訂之工具，如地理學、小學、輿地、金石、版本、音韻、天算諸門之學，皆用之以助考史；史學家亦往往兼習經學家、小學家、輿地學家、金石學家、版本學家、音韻學家、天算學家。此與近代歐美史學家利用語言學、文字學、邏輯學以及一般自然科學以治史，科目雖不盡相同，而其欲以補助科學，使歷史研究，幾於科學之研究者則一。

### (4) 歷史考證學派治史之理論基礎

大凡天下之事，以極勇銳之勢力，浩瀚之氣魄，以終身從事



之者，皆由於其自我篤信之理論基礎，無處則傾然喪矣。歷史考證學，極枯燥之學問也，而此派史家從事之者，樂起盡然，王鳴盛於十七史商榷序云：

「嗜啜啜吟，曉窗擊唱，細書飲格，夾注疏行，每當目輪大爆，肩山石壓，猶且吮殘墨而凝神，粥先豪而忘倦，時復照坐而觀之，緩步而歸之，竹眼林上，而尋其曲折，忽然而有得，躍起書之，鳥入雲，魚躍淵，不足喻其疾也。頗視書上，有華雲一盃，藕飯一盃，於是乎引飯進盞，登春台，饗太宰，不足喻其適也。」

一般歷史考證學家皆享高壽，或由於其心情怡悅所致。彼等何為學生殫精於此枯燥之學，而仍樂趣無窮哉？王鳴盛云：

「大凡人學問精實者必謙退，虛偽者必驕矜，生古人後，但當為古人考據訂疑，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為功，其情最為可惡。」（十七史商榷通鑑與十七史不可偏廢條。）

又云：

「學者每苦正史編纂難讀，或選典制茫昧，事蹟樛葛，地理職官，眼味心營，試以予書為孤竹之老馬，置於其旁，而參閱之，疏通而證明之，不覺如開關解鎖，筋轉脈搖，殆或無小助也歟？夫以予任其勞，而使後人受其逸；予居其難，而使後人樂其易，不亦尊乎？以予之識暗才懦，碌碌無可自見，擬以收訂之役，穿穴故紙堆中，實事求是，庶幾啓導後人，則予懼其亦可以稍自慰矣。」（十七史商榷序。）

錢大昕云：

「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匪為齟齬前人，實以開導後學，而世之考古者，拾班彪之一言，擅沈肅之數簡，兼有竹素爛脫，豕虎傳謬，易斗分作升分，更日及為白晝，乃出校書之陋，本非作者之管，而皆文致小疵，目為大創，馳聘筆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博大，輕以褒貶自任，強作聰明，妄生燕瘡，不卞年代，不揆時勢，以強人以所難行，貴人以所難受，陳義過高，居心過刻，予尤不敢效也。幸檢景道，學殖無成，唯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二十二史考異。）

又云：

「學問乃千秋事，訂編規過，非以警嚴前人，實以嘉惠後學。但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則餘無足觀耳。鄭康成以祭公為董公，不審其為大儒；司馬子長以子產為鄭公子，不審其為良史。古之不足傳者，其得失固不足辨；既自命為立言矣，千慮容有一失，後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貽累於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當樂有朋友，不樂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誤謬耶？吾雖不言，後必有言之者，雖欲掩之，惡得而掩之？所慮者古人本不誤，而吾從而誤之，此則無損於古人，而適以成吾之妄，王介甫鄭漁仲輩，皆坐此病，而後來宜引以為戒者也。」（答王西莊書）

由以上可歸納出歷史考證學治史之理論基礎，約略有三：

一、援摭古人，為古人考據訂疑。

二、嘉惠後學，將史之茫昧標葛處，疏通而證明之，自任其勞，而使後人受其逸；自居其難，而使後人樂其易。

三、實事求是，追尋真理，去古人之一非，成史籍之信真。由此三原動力推動，一般聰明才智之士，故皆樂在其中，流連而不知反顧矣。

## 二 王鳴盛之歷史考證學

(1) 王氏論經史之異同

王氏精於經學，於東漢經學，最有研究。趙翼說王氏詩云：

「歲在龜蛇歲可驚，儒林果失鄭康成。」（陝北集王西莊光樓魏詩）

又云：

「東壁攻書到老翁，未曾一日觀研窮，遙披漢宋遺文碑（趙氏注云：公輩精鄭學。）不門虞初小說工。復單直如真學問，幾時再有此淹通，存亡莫道無關係，直在蒼茫氣數中。」（同上）

說經重辨法，反對以意說經，故於唐以後經學感傷最多。王氏云：

「兩漢專辨法。……自唐中葉以後，凡說經者，皆以意說，無辨法。夫以意說而廢辨法，此夫子之所謂不知而作也。」（商榷師法條，以下十七史商榷皆關係商榷。）

又云：

大陸雜誌文學叢書

第二輯第六冊

清乾嘉時代之歷史考證學

「自唐高宗武后以下，詞條繁興，經書遂以凋喪。宋以道學矯之，義理雖明，而古書則愈無人讀矣！」（商榷藝文志考條條。）

所撰而書後當三十卷專宗鄭康成注，鄭注亡遺者來馬融王肅注補之，孔傳雖備，其訓注非盡虛造者，間亦取焉，唐以後諸儒之說，則概擯棄之矣。對宋人攻擊甚猛烈，嘗云：

「識暗心粗，靡大乎滑，宋人通病。」（商榷臧瓊說經體條）

又云：

「心虛膽大，而自以為是，蔑棄前人，落筆便肆，宋人往往如此。」（商榷宣武師學董劉韓事條）

對明人亦發批評：

「明代諸公刻論，不讀唐以後書，此輩固不讀唐以後書矣，而亦何嘗讀唐以前書乎？勅其字句，襲其聲調，但以供時文之用，遂可謂之能讀乎？若果實能讀唐以前書，雖未讀唐以後書，吾必謂之學矣。然果實能讀唐以前書，其勢亦必須會通宋元，必不能戩然自唐而止，重斷鴻溝矣。經學史學姑不論，即唐以前文集，七才子所摹擬，大抵不過幾名家，幾大家，且多看選本，少看全集。博觀而約取，去短而舉長，惟深心嗜古之士，為能然也。」（商榷唐人文集條）

大抵王氏之經學，循吳派惠棟之藩籬，以漢儒為宗，去此不取，稍有所縱橫。由此原則以治史，故體健平實，實事求是，不敢馳騁議論，擅加褒貶。惟王氏治經而不取駁經，治史則擇善而

從，正史有失，亦加臆疑，此王氏史學之所以卓越於經學也。其論經史之異同云：

「予東甯好讀史學；將壯，經史而治經；既既，乃重理史書，摩研排繯。二紀餘年，始悟讀史之法，與讀經小異而大同。何以言之？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本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讀史者不必以議論求法戒，而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不必以褒貶為與奪，而但當考其事蹟之實，亦猶是也。故曰同也。若夫異者則有矣，治經斷不敢臆疑，而史則雖予長孟堅，苟有所失，無妨疑而疑之，此其異也。仰治經直持不敢疑經而已，經文難與難通，若於古傳注悉已選擇取融貫，猶未免於潛越，但當墨守漢人家法，定從一師，而不敢僭從，至於史則於正文有失，尚加臆疑，何論製新師古一輩乎？其當擇善而從，無庸偏徇，固不待言矣。故曰異也。要之二者雖有小異，而總歸於務求切實之竟則一也。」（商榷序）

王氏治經迷信漢儒，識見固不高，即所論經史之關係，見解亦遠不若錢大昕章學誠高超。錢氏謂經史不可分，章氏則進一步曰：「六經皆史也。」（文史通義易教上）中國史學之地位，自章錢二氏出而獲得提高。王氏之見，不及此也。惟王氏治史不肯從，則有足多者，其論作史不得擬經，尤有獨見：

「編年雖古法，而古不可泥，宜以後出為定。即如尚書敘誓篇，首突者時甲子味爽，金縢篇首突者既克商二年，康誥篇首突者惟三月哉生魄，此直後之史官所當取法乎？春

秋或書葬，或不書葬，或降而稱人，或書名，或書字，或書日，或書月，說者以為夫子竟有子卒，此直後人所可要效乎？可見作史不得擬經。」（商榷正史辨年二體條）

值於清代中葉，有此看法，亦殊難得矣。

（2）王氏治史重紀實

王氏認為所書乎為史者，據實直書，使善惡之迹，炳著於天下後世而下後世，不必舞弄文法，不必辯發議論，其言曰：

「大抵作史者宜直敘其事，不必弄文法，寓子卒，讀史者宜詳考其實，不必憑意見，發議論。」（商榷唐史論斷條）

又云：

「凡所貴乎史者，但欲使善惡事迹，炳著於天下後世而已，他奚世焉？今觀此二紀（指舊唐書昭宗二紀），見亂賊一筆之在兇殺逆，歷歷如繪，照耀然犀，情狀畢露，使千載下可以考見，亦何必恨其太詳耶？世間浮華無實文字。吳黎禍亂，充棟汗牛，何獨於紀載實事，必吝此勞耶？至於詔令制敕備載，幾欲雙字無遺。遙想一時附和小人，欺天負地，掉弄筆墨，誣善醜正之詞，喪心滅良之語，續史家詳述之，又得聞人證等搜獲於死亡之後，而重刻之，其功太矣。新書於舊紀當然塗抹，僅存無幾。若若紀舊約一萬三千字，而新約只千字，自謂闡展，實則纂取惡迹，皆不見矣。使新書存而舊書竟亡，讀史者能無遺憾乎？」（商榷昭宗二紀獨詳條）

史以紀實，「曾疑如何」之往事，赤裸裸暴白陳述，為古今

中外不可移易之公理。王氏之論點，可謂已獲得史學之重大前提。王氏充此紀實之論，及於一般有關之史學問題：

「六朝人紀實實事，每不明析，因直書其事，恐詞氣燥

德，觀者嫌之，乃故作支離。不知書事但取明析，何用枝點乎？」（商榷新紀太簡條）

「新唐書本紀敘舊書減去十之七，可謂簡極矣，意欲仿班陳范也。夫文日趨繁，勢也。作者當隨時變通，不可泥古。紀唐而以班陳范之字行之，於情事必有所不盡。」（商榷新紀太簡條）

「春秋書法，去聖久遠，難以揣測，學者但當闕疑，不必強解，惟考其事實可耳。況乃欲擬其筆削，不已僭乎！充之是非千載炳著，原無須書生筆底予奪。若因昇筆，反令事實不明，豈不兩失之？」（商榷粵昭德來後臣書法條）

「歐公乎筆誠高，學春秋却正是一病。春秋出聖人手，義例精深，後人去聖久遠，其能窺測，豈可妄效？且意主褒貶，將事實查量刪削，若非舊史復出，幾真無假。」（商榷歐法春秋條）

對專廷壽南北史屢時批評，由於專廷壽往往刪削有關係之史實也：

大陸雜誌文學叢書 第二輯第六冊 清乾嘉時代之歷史考證學

「南史意在以刪削見長，乃所刪者往往皆有關係民生疾苦，圖計利害，偶有增添，多錯雜瑣瑣，或鬼佛誕妄。專廷壽刪本本不知有經國養民遠圖，故去取如此。」（商榷宋書有關民事語多為南史刪去條）

引用史料，則實考核斟酌的，不預存實錄皆是，小說盡非之成見也：

「大約實錄與小說，互有短長，去取之際，實考核斟酌，不可偏執。如歐史溫兒金足傳，載其欲得取穀子擊盆呼曰：朱三，爾塘山一百姓，滅唐三百年仕糧，將見汝赤族云云。據禹稱謂梁史金足傳，但言其朴野，常呼帝為三，肆博戲事。所謂梁史者，正指梁太祖實錄。今詳史金足傳亦不載博戲詆斥之語。歐公采小說補人叢抄。然則采小說未必皆非，依實錄未必皆是。」（商榷歐史喜采小說補史多本實錄條）

有所論者，不特詳注出處，且必目睹原書，不敢輕信傳聞，或間接移用轉手之記載也：

「予所著述，不特注所出，并墨指第幾卷第幾條。且必目睹原書，佚者不列。」（商榷十國春秋條）

有關史學之實物，則親訪之，以徵史實，不詳跋涉之勞也：「今蘇州虎邱千人石畔有大佛頂陀羅尼石幢一座……高約二丈餘。……予少與妹婿錢大昕同遊，訪得此幢。及老，先後歸田，予從家湖渚，距虎邱三里，時往摩挲。妹婿來，又同觀焉。八九百年中，著錄自吾兩人始。每嘆金石之有關史學，惜同嗜者寡也。」（商榷吳越政元條）

由上可知王氏治史之微實態度，王氏一生精力，即萃萃於此。

### 3 王氏著述之方法及目的

王氏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於校勘本文，補正謬脫；審事述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吾人披覽正史之際，遇典制茫昧，事蹟膠葛，得王氏之說，每每豁然而冰釋。故商榷一書，在清代著述中，與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趙翼二十二史劄記齊名。

王氏撰寫商榷，主要方法，在於校書。甲書與乙書相校，野史與正史參證；一史之中，紀傳表志，互相稽考，由是而異同立見，由是而誤謬可尋。王氏云。

「予識暗才拙，一切行能，舉無克堪，惟讀書校書頗自力。嘗謂好著書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讀之不勤而輕著，恐著且多妄矣。」

紀以來，恆獨處一室，草蟲史事，既校始讀，亦隨讀隨校。購借善本，再三讐勘；又搜羅偏竊雜史，裨官野乘，山經地志，摭摭簿錄，以暨諸子百家，小說筆記，詩文別集，釋老異教；旁及鐘鼎彝鼎之款識，山林家墓祠廟伽藍碑碣斷闕之文，盡取以供佐證，參伍錯綜，比物連類，以互相檢照，所謂考其典制事蹟之實也。」（商榷序。）

王氏認為校書為著書之基礎工作，由校書而讀書，由讀書而著書。脚步一亂，則非誤即妄。此尤可見王氏實事求是之治學精神也。惟史學上之校書，與一般校醫學不同，一人持本，一人讀

者，見異必錄，皆恐家相對，一般校醫學也。史學上之校書，則為廣義的校醫學，不但校其字，亦且校其義；不但校其異，亦且校其同，故不惟購求善本重要也，廣蒐雜錄別史，遍訪鐘鼎等類實物之記載，參伍錯綜，此物連類，尤為重要。王氏則皆降力及之矣。

王氏著述之目的，亦由校書之觀點出發。古書脫誤難讀，王氏每致慨歎：

「古書傳鈔錄刻，脫誤既多，又每為無學識者改壞，一閱卷輒嘆千古少能讀書人！」（商榷黎斐條）

故王氏著商榷，主要以十七史之校訂者自居：

「十七史者：海虞毛晉汲古閣所刻，行世已久，而從來有全校之一困者。予為改謬文，補脫文，去衍文，又舉其典制事蹟，詮解蒙滯，審覈謬誤，以成是書。」（商榷序）

「以予書為孤竹之老馬，置於其旁而參閱之」為王氏對商榷一書得世行遠之期望，別出新意，自成一家之言，王氏自愧未逮，謙論衰駘，尤所反對。王氏云：

「嗚呼，予豈有意於著書者哉？不過出其校書讀書之所得，標舉之以始後人，初未嘗別出新意，卓然自著為一書也。如所謂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與夫強立文法，擅加與奪震駘，以筆削之權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然則予豈以不著為著，且雖著而仍歸於不著者也。」（商榷序）

王氏著述之目的如此，商榷之價值，可由是而窺焉；歷史考

證學派對史學之貢獻，亦可由是而見焉。

(4) 十七史商榷可議之處

王氏力詆駁辨議論，而十七史商榷中，亦偶有駁辨議論之處，如「陳平邪說」條云：

「陳平小人也，漢得天下，皆藉信功，一旦有告反者，聞左望稱，略無證據，平不以此時獨疑其陰，乃倡偽遊雲夢之邪說，使信無故見誅，其後為呂后所殺，直平實之耳。迨高祖命即軍中新樂，而平械之歸。嘗呂氏實之，故平活之，其搆時附勢如此。且平六出奇計，而其解白登之圍，神圖畫其人，以達閻氏，計甚庸鄙，又何奇焉。」

「范雎傾白起殺之」條云：

「白起破趙長平，詐坑其卒四十萬，自謂建不世之功，孰如范雎已何其後傾而殺之，天道惡殺而好運，豈不可懼哉！若雎，亦小人之尤也。夫起在秦，則可謂勞臣矣。唯惡其偏己，必置之死地而後快。蓋自古權臣欲竊人主之威柄，雖有良將在外，務製其肘，使不得成功，善且從而謀蒞之，其但為一身富貴計，而不為人主計，有如此者。」

他如「項氏擊計四」「劉持項虛項」「信自立為假王」「信反而攻故主」「瑜者吳而同」「鄭攸」諸條，非奸謀人物，即縱論史蹟，與其著述之態度及全書自定之體例不合。此為其自相矛盾處。若觀大昕之二十二史考異，則無此等處矣。

王氏於商榷中每條，標題亦有不附其體明顯者。如「王守澄傳新舊互異」條標題王守澄傳新舊者較舊者為得實；「黃巢傳二書詳略甚遠」條標題黃巢傳新舊者遠較舊者為詳備；「舊周利貞傳太

略」條標題周利貞傳新舊者甚詳備，由虛情實；「魚朝恩傳新舊互異」條標題魚朝恩傳新舊詳於舊者，魚朝恩惡橫之狀，新舊描摹由虛；「范蔚宗以謀反誅」條則辨范蔚宗未嘗謀反也。如以「王守澄傳新舊較舊者為得實」「黃巢傳新舊遠較舊者詳備」「周利貞傳新舊詳備者太略」「魚朝恩傳新舊詳於舊者」「范蔚宗未嘗謀反」標題，則具體而明顯多矣。即以「武陵王紀南梁互異」條而觀，如云「武陵王紀南梁史乘互異」，豈不更佳？大抵王氏於商榷中每條標題，具體詳確，明顯醒目，遠不逮趙翼二十二史劄記中所標者。此又其微可疵處。

### 三 錢大昕之歷史考證學

歷史考證學派最特出之史學家，亦即對於史學貢獻最大者，為嘉定錢大昕氏。

錢氏學通天人，博極古今所著二十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潛研堂文集諸書，考訂之精詳詳審，當時無出其右者，往往數千年來史籍未正之謬誤，皆一旦提正，昭然若揭。其治史也，利用經學、小學、天文、輿地、制度、金石、版本諸專門之學為基礎，旁徵博采，反覆考訂，以歸納法尋求史籍之真例，以演繹法解經史實之誤謬，實事求是，不涉虛誕。歷史考證學於是遂當為科學之精神，而與現代史學家之考訂史料方法，大半吻合，此誠為錢氏之最大貢獻。十八世紀中國史學界鮮有史籍巨著，僅以考據用力最大，成就最多，方法最謹嚴，使人罕有可乘之隙者，則不能不推錢氏。十八世紀中國之史學，雖稱之為錢大昕時代，亦無不可。

錢氏對於元史用功尤深，以明洪武所修元史，蕪謬漏落，乃另為編次，重新改修。時值乾嘉，文網森嚴，全書稿本，是否完成，至今未能確知。遂使一部極精美之歷史巨著，既未公諸於世，并其存佚亦在若明若昧之間，而錢氏乃僅以考證學名家，此不能不為錢氏惜，尤不能不為清代史學界惜也。

(一) 錢氏歷史考證學之合於近代史學方法

錢氏自史漢至元史，皆潛心研究，詳加考訂，所著二十二史考異，諸史拾遺諸書，雖似讀史隨手札記之作，而以其學識之豐富，識見之精深，往往足發千載之蘊，而成不刊之論，易代之下，歎為精絕。如十駕齋養新錄「漢書景祐本」條云：

「予撰漢書考異，謂哀帝紀元壽二年春正月元壽二字衍。文、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孝成五人成卿當作成卿，樂成下衍覽字。百官公卿表寧平侯張歐寧當作室俞侯，樂成下衍覽字。安年侯王章年當作平，平喜侯史中喜侯，樂成下衍覽字。廣漢太守孫實當作實。五行志能者養之以福，當作養，廣漢太守孫實當作實。五行志能者養之以福，之以當作以之。地理志遼山長谷諸水所出諸當作諸，博水東北至鉅定博當作時。張良傳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陳留，陳字衍。枚乘傳凡可讀者不二十萬，不當作百。韓安國傳無城安人也，城當作成。韋賢傳實為亞人當作亞。侯才傳雋雄思侯夫人，雄當作缺。項見北宋景祐本，此十數處皆與予說合。」

其考訂之精審，為何若耶！此固由其才智之過人，學力之深厚有以致之，而主要原因，則為史料之擴充與補助科學之利用。由此點言之，錢氏之歷史考證學，實最合近代之史學方法者也。

今請言其大端：

一曰雜史之應用也。錢氏不專信一史，無正史必無錯誤之觀念。正史之外，博採雜史，以資補訂，而又斷之以理，折之以情，務使歷史真相，大白而後已。遺史道宗紀曾有壽隆年號，錢氏於考異則云：

「按洪邁泉志載壽昌元寶錢引李與東北諸蕃福要云：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又引北遼通書云：天祐即位壽昌七年，改元乾統。于家藏易州興國寺碑安德州靈巖寺碑與中府玉石觀音像唱和詩碑，皆壽昌中刻。東都事略文獻通考皆宋人書也，亦稱壽昌，無有云壽隆者。可證壽隆乃壽昌之誤也。遼人理於避諱，如光祿改為崇祿，避太宗諱也；女真改為女直，避興宗諱也。天祚名延禧，乃遼改重熙年號為重和，於嫌猶必回避如此，道宗乃聖宗之孫，而以壽隆紀年，此理所必無者。」

以遺史不可信，故旁採洪邁泉志所載，而又恐有錯誤，復證以家藏碑刻，證以東都事略，文獻通考，證以遼人避諱之情形，然後壽隆年號之誤，乃大白。錢氏考證，似此類者，不勝枚舉，茲於續通志列傳總敘明言之云：

「史臣載筆，或囿於聞見，采訪弗該，或慎於權辭，于筆失當。冊啟補亡訂誤，必當博涉羣書，考唐宋建隆元明正史之外可備取材者。編年則有司馬光、朱熹、李燾、卓心傳、陳均、劉時舉、陳澧、薛應旂、王宗沐、商格；別史則有曾鞏、王偁、葉隆禮、宇文懋昭、柯維騏、王維翰、鄭遠平；典故則有杜佑、王溥、王欽若、馬端臨、章懷明、

王折；傳記雜事則有溫大雅、劉肅、韓愈、王島偶、鄭文寶、林炯、馬令、陳游、張唐英、宋敏求、李心傳、徐夢莘、杜大圭、徐自明、王鼎、劉祁、元好問、蘇天爵、陶宗儀、鄭曉、王世貞、沈德符、孫承澤等，遺書具在，以及碑版石刻，文集選本，輿地郡縣之志，類事說部之書，並足以證正史之異同，而補其闕漏。」

此與趙翼於廿二史劄記小引所云：「周有棟東歷說，與正史歧互者，不敢遽比爲得間之奇。蓋一代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蒐入史局，其所善而不取者，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或反據此疑正史之說，不免貽譏有識。」兢兢惟正史之當信者，固不可同日而語，此顧氏歷史考證學之合於近代史學方法一也。

二曰善本之應用也。考訂古書，首先須求善本，無善本之根據，縱使考證精確，毫無錯誤，而終不能使人心折首肯。顧氏於纂新錄「經史當得善本」條云：

「經史當得善本。今通行南北並及汲古閣本，儀禮正文多脫闕；穀梁經傳文亦有漏錯；毛詩往往以釋文混入鄭箋；周禮儀禮亦有釋文混入注者；禮記則禮器坊記；中庸大學疏殘缺，不可讀；孟子每章有趙氏章指，諸本皆闕；宋史孝宗紀闕一葉；金史禮志太宗諸子傳各闕一葉，皆有宋元雜本，可以校補。若日讀誤書，妄生駭難，其不見笑於大方者鮮矣。」

由是可知其對善本之重視。其於「漢書景佑本」條既利用漢書景佑本以證其考證之不誤矣，而後漢書陳王長傳云：「直詔使封爲陳王，食淮南郡。」顧氏於考異復以嘉靖本證淮南爲淮陽

之誤云：

「淮南當作淮陽，和帝紀改淮陽爲陳國，遺詔使西平王長爲陳王，是其證也。淮陽王炳以章和元年薨，未爲立嗣，故以其地改封長，參考紀傳，左驗明白，或疑淮當爲汝者非也。後見嘉靖閣本，果作淮陽，私喜予言之不妄。」

以考證之結果，補之於善本，此爲至可信者。顧氏訪求善本，不遺餘力，故其考證亦精審少誤。此顧氏歷史考證學之合於近代史學方法者二也。

三曰金石之應用也。金石之文，與經史相表裏。蓋竹書之文，久而易壞；手鈔板刻，展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於千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元史太祖紀云：「十年（乙亥）四月詔張瑄總北平十提控兵，從南征。」據瑄叛伏誅，據瑄遣據錦州，僭號漢興皇帝。」顧氏於考異勦云：

「按史述神道碑，丙子錦州界帥張致叛，丁丑從王提大軍攻拔之，張致伏誅。此紀會張致叛於乙亥，討平於丙子，皆差一年。蓋沿元明善所撰木華黎世家之誤，當以碑爲據。史編傳又天安丁丑從討叛人張致，平之，正與碑合。」

顧氏於纂新錄「持勳當從石刻」條文云：

「突厥傳可汗者，彌古之單于，其子弟謂之特勒，顧氏金石文字記歷引史傳中稱特勒者甚多，而涼國公契嵩明碑特勒字再見，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勒植沒，斯皆書者之誤。予謂外國語言，華人鮮通其義，史文轉寫，或失其真，惟石刻出於當時真迹。況契嵩碑宰相雲歸德所撰，公惟亦奉勅書，斷無搗辨，當據碑以訂史之誤，未可輕嘗議



也。」

皆以金石碑銘，參證史實。此錢氏歷史考證學之合於近代史學方法者三也。

四曰避諱之應用也。錢氏由史籍之避諱，多所發現。如於後漢書考異云：

「韋暉注范史，避太宗諱，民字皆改爲人。如光武紀死人塗炭，爲人父母，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是也。今本仍有作民者，則宋以後校書者四改。然亦有不當改而妄改者，如建武七年詔郡國出警因見徒免爲庶民，十一年詔赦免均奴婢，論如律，免所免灼者爲庶民。……此庶民本當作庶人，校書者不知庶民與庶人有別而一例改之。……凡律言庶人者，對奴婢及有罪者而言，與他處泛稱庶民者迥乎不同。」

史由避諱發現注文誤入正文之中，如後漢書郭太傳云：「初奉始至南州，過東臺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挽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錢氏考異則云：

「予初讀此傳，至此數行，疑其詞句不倫。蔚宗避其父名，篇中前後皆稱林宗，即它傳亦然，此獨書其名，一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疑也。叔度書字而不書姓，三疑也。前云於是名震京師，此又云以是名聞天下，詞意重疊，四疑也。復得閩中舊本，乃知此七十四字，本韋暉注引謝承書之文，叔度不書姓者，蒙上入法南

則交黃叔度而言也。今本皆僅入正文，惟閩本不失其舊。閩本係明嘉靖己酉歲按察使周采等校刊，其源出於宋刻，較之它本爲善。如左原以下十人附書林宗傳末，今本各自跳行，閩本獨否。」

由范蔚宗之避其家諱，與其他附帶原因，而發現初奉始至南州以下七十四字本章標注引謝承後漢書之文，此校勘學上最大之發現，亦最精密之考訂工作。此錢氏歷史考證學之合於近代史學方法者四也。

五曰異例之應用也。錢氏精於異例之學，於纂新錄「說文述上篆字爲句」條曾云：「古人著書，闕而有法，好學深思之士，當尋其異例所在，不可輕下雌黃。」論春秋則曰：「明乎春秋之當尋其異例所在，不可輕下雌黃。」故錢氏每讀一書，皆先究其異例所在。更由例，可與古史矣。」故錢氏每讀一書，皆先究其異例所在。更由其異例，推而演之，以解釋史實，考訂誤謬。三國志諸葛亮傳，亮與徐庶並從、注、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錢氏讀史始遭則辨之云：

「曹魏略列傳以徐福嚴輪孝義等十人共卷，幹、鳳皆馮翊東縣人，馮翊東縣，皆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見吳澤傳注）。又魏略儒宗傳，蘇夏天水人也，天水舊有見闕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爲單家。魏楊京先人也，世單家（見王肅傳注）。魏略吳質傳，始質爲單家，少游遊貴戚間（見王肅傳注）。張既傳，既世單家（見既傳注）。凡云單家者，猶言寒門，非郡之著姓耳。徐庶爲單家子，與此一例。流俗諺單爲善，疑其本姓單，後改爲徐，妄之甚矣。後漢書趙壹傳，恩澤不達於單門，亦單家之意也。」